

評入江昭「超越帝國主義，1921-1931： 遠東新秩序的尋求」

李 恩 涵

書名：*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作者：Akira Iriye

出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5;
paperback edition, Atheneum, New York, 1969

頁數：PP. 375

本書出版到現在已有十七年之久，發行後即多佳評*，為著者入江昭教授最初奠定聲名之作，多年來更成為研究我國近代外交史者必讀的一本著作；但時至今日，當東亞的國際局勢又重新進入一新的中、俄、日、美國際大平衡的階段之時，雖然中日之間的關係已經大大地主客易勢，與二十年代有着基本性的不同，但站在中國學術界的立場，本書仍然有重新予以評介的價值與必要。著者為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歷史系副教授，現任芝加哥大學教授。他在近十五年來所出版的論著，數量多而出色，單就所撰編的書籍而論，除本書外，即另有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67);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1968);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1972);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1974); *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U. S. Foreign Policy before 1914*; *Mutual Images: Essays in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 (1975);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1981) 等八冊之多。另外他所撰寫的研究性論文散見於著名學者 Albert Fuerwerker, Albert Craig, Dorothy Borg 等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5, No. 4 (August 1966);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LXXI, No. 4 (July, 1966); *Pacific Affairs*, Vol. XXXVIII, Nos. 3&4 (1965-1966).

所編各書與美國亞洲研究學報(*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內者也有多篇；此外，入江昭教授也能用日文寫作，其日文論文多篇曾刊載於國際政治等雜誌。在近二十多年來，日裔美籍學者中研究近代中國外交問題的，他毫無問題的是最傑出的一位——功力深厚，見解深刻，論著結構精審，而英文文字的洗煉與精確，均為其特色之處；而最重要地，他實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中日、日美關係研究的「新修正主義」解釋的代言人，在他許多種著作中頗能代不甚精通英文的日本學術界立言，表達日本人對戰前外交的一些觀點與想法；而本書作為其原撰博士論文的奠基性著作，尤其具備上述所提到的多項特徵。近年來，著者主要的研究興趣，已轉移至日美關係方面，而去年（一九八一）哈佛大學出版部為他出版的上述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霸權與文化：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的日美戰爭）一書，即為全盤綜合討論美、日關係史中最為重大的「太平洋戰爭」的重大問題，極為學術界所重視。

本書在所用資料方面，完全符合研究外交史利用多種文字、多種檔案的基本標準；作為一位外交史的研究者，著者不只參閱過日本、中國、美國等三主要有關國家所出版的政府外交文獻，對於上述三國現已開放閱覽但尚未正式出版的政府檔案與私人文件，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民國外交部檔案」及美國華盛頓國家檔案局所藏的美國外交檔案與散存各處公私機構中的 Edgar A. Bancroft Papers, William E. Borah Papers, W. Cameron Forbes Papers, Joseph C. Grew Papers, Nelson T. Johnson Papers, Henry L. Stimson Papers 等等，均曾予以充分利用。而最重要地，他是第一個大量運用美國戰時所擄獲日本外務省與陸、海軍部機密檔案資料於研究從北伐至九一八事變的一段中日關係之人。入江昭氏甚至更曾親訪日本防衛廳的戰史部門，檢閱有關戰前中、日交涉的一些密件。此外，他也參閱了數種俄人有關的著作。不過，本書在資料運用與闡釋方面最顯著的一項特徵，乃是大量引用日文檔案與論著中所包含的多項觀點，而在敘述與分析這些觀點時，他所用的方法則極其技巧——在許多項討論與暗示性的結論中，雖然表面上均具備客觀探討歷史史實的各项基本特徵，實際他深受戰前日本對華觀點與論辯的影響，處處在成熟圓潤的文字之下，表達着日本戰前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所具侵略性而自以為是的各項觀點，實毫無疑義（如本書頁二一、二八，視北伐時期的中國，非一「主權國家」，因中國多年內亂，政出多門；即為戰前日本經常侮藐中國的基本「爛言」老調，好像中國的內亂，日本無任何推動煽惑的「責任」

一樣；而自另一方面而言，也正因為中國內亂的延續，亦可見國民革命重建中國的必要性。）對於深受中國民族主義思想薰陶的當代中國學者而言，入江昭論辯的某些前提上，彼此確實枘鑿而格格不入；中日兩國最後之必然地訴之於一戰而絕無妥協的餘地，本書所敘述的一些日方觀點，表現地最為明顯不過了。所以，本書的真正價值，也許能「客觀」的表示出當時中日衝突的一些根源與發展的過程，但在全盤性大問題的解釋上著者卻拒作論斷（未對日本政軍領導人物的無知與狂妄作片言批評），著者顯然未將過去與「現在」聯貫起來，所以，本書究竟難以算做最上乘的史學著作。

在結構上，本書實在是組織緊密、技巧而無懈可擊。全書藉美國所倡議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一九二〇——一九二一）中所簽訂的一系列條約與協定如九國公約等為討論的起點，認為此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遠東國際新情勢的一項新基礎，為「美國方案」(American Initiative) 的國際模式，即作為全書的「前言」部份；此後，即進而將全書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蘇俄對「美國方案」挑戰的「蘇俄方案」(Soviet Initiative)，計包括有三章，從中國北方軍閥的混戰，談到蘇俄之援助中國國民黨改組與國共合作，及此後國民政府北伐期間國民黨內部左、右派不同的政治立場與不同的外交處理方案與政策，也進一步談到英、日、美三主要國家對於中國革命新情勢不同肆應的看法與策略。第二部份為對「美國方案」直接反應的「日本方案」(Japanese Initiative)，也包括有三章：首先從英、日、美三國對國民黨左派武漢政權的態度與對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的立場與政策談起，其次則談到日本之兩次出兵山東與日本數屆外交當局如幣原喜重郎、田中義一（首相兼外相）與第二次幣原外交對中國革命統一運動的對策，與對中國東北的各項圖謀與其基本的一些立場；最後則從日本軍人不服從政府決策的角度，來分析一九二八年濟南五三慘案、謀殺張作霖案與九一八事變的發動等等。第三部份則在「中國方案」(Chinese Initiative) 的大標題下，也包括有三章，首先自南京國民政府再度北伐期間的外交談判談起，接着即就中國表面上全國統一後所從事之撤廢不平等條約的多項談判，分就美、英、日三國的順序，敘述其進展的歷程與其所遭遇的各項困難。最後一章的標目為「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經濟外交的失敗」，則詳述在一九二九年世界性經濟大恐慌的刺激下，南京國民政府的王正廷外長於收回關稅自主權之後全心貫注致力與各國談判撤廢治外法權，並重訂平等新約；其目標雖著重在英、美兩國，但與日本的談判也於同時進行。惟王氏與張學良既不願與日本就其在中國東北的權

益互相妥協，承認日本多年來亟謀擴展其既得權利增築多條新鐵路的計劃，又藉手不承認「廿一條條約」（即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與一八九六年的中日商約來壓迫日本重訂平等新約，因此，使日本政府無法以「和平」方法達到其囊括東北的目的；而日本軍人則利用「幣原外交」的失敗為口實，陰謀發動了公開侵占東北的九一八事變。這些不服政府控制的關東軍中級軍官（如坂垣征四郎與石原管見等）與陸軍參謀本部內的中堅份子（如建川美次、永田鐵山等），乃自行發動軍事行動，製造口實，利用公開性的軍力以侵占整個東北，以謀一舉而完全占有中國東北（利用傀儡製造「滿洲國」）的既成事實。

著者在此三大部份中的每一部份的多章多節中，很能對所涉及的中國內外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與外交等方面互相關聯的各項情勢，條分縷析，系統相當清晰，而要言不繁，論辯引人入勝。著者本人並未表明他個人對於中日關係迅速趨向於公開而無法妥協的衝突過程中的意見與立場，作為一位追求真實的歷史家，入江昭氏顯然很能表現出無可疵議的冷靜；但由於他在許多重要的論題上，多係引用日本資料，其論辯的進行層次，也多為戰前日本政府與軍部所屢屢重複申述的一些論點與「爛言」，著者已經強烈地暗示，深受世界經濟大恐慌所困擾的日本政府已無力控制軍人對中國採取直接的軍事行動，而南京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執行也使日本對東北的長期性圖謀，已無何迴旋的餘地，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乃為不可避免的事了。

由於大量引用日本公私兩方面的資料與觀點，入江昭因此認定一九二八年的五三濟南慘案為日本軍人要「立功」，蓄意想激怒中國，以製造中、日間擴大性的軍事衝突，以實現其全面武裝進攻華北的目的（頁一九四、一九八——一九九）。著者雖然在文中也引用中國方面羅家倫的文字，但在事實的敘述上，卻不予採用，而認定日本駐濟南總領事與居民要和平，惟日軍司令卻要「戰爭」（頁二〇一、二二一）。表面上此說雖似「公正」，實際卻為近年日本史學者誘過軍閥的「濫調」而已。在我們看起來，日本田中義一內閣之蓄意阻撓中國北伐、製造中國南北分裂的意圖，無論如何是無法擺脫干係的。田中義一與許多當時日本的政客顯然都是日本侵華的急先鋒（戰爭販子）。著者又認為五三慘案的衝突，如中、日兩軍均不進入濟南，即可避免，而蔣總司令並未答允不入濟南（頁一九四、一九八），似乎暗示慘案的發生，中國也有很大的責任。其實，濟南為中國領土，為何中國的國軍不可進入該城以消滅中國軍閥？日人說法的荒謬，此為一例。對於暗殺張作霖的陰謀，

著者則目為關東軍中級軍官河本大佐等的策劃與執行（頁二六二、二七六、二九二）；因此，他的結論是：一九三〇年後日本軍人所構想的對華策略，與日政府所擬的策略，甚不相同，而雙方想法的差距，愈來愈大；是年關東軍已擬定了征服中國東北的全盤計劃了（頁二七六）。同時，東京的陸軍省所擬定的「軍事行動的三階段計劃」，則首先擬壓迫東北張學良當局尊重日本的「有形」與「無形」權利；否則即支持另建一親日政府；最後則以武裝力量併吞之列中國東北為日本版圖。陸軍當局在此計劃中，甚至計劃與阻撓日本實施此計劃的西方國家（指美國）一戰（頁二七六——二七七）。不過，陸軍軍部所擬開始行動的預定日期為一九三二年，而坂垣、石原等預定的行動日期則提前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即發動了（頁二九二、二九四）。對於日本政府整體所涉及於這些陰謀與暴行事項的程度，著者在研究方面並未著力探討，其全力描述深入研究的，則多為這些個別陰謀者進行陰謀的細節。在這方面，當然有其必要，但對於日本政府高層主政者之參與的研究，如果有受過高深史學與外交史訓練的中國學者能夠有機會就日本外務省與軍部檔案作一深入而客觀的探討，其所「重建」事實與層次發展的著重所在，定必與入江昭的所見不同——雖然大家都以尊重「客觀事實」為其共同基本的信條。外交史常常是政治信仰與立場的反應，在這方面實首先表現於「著重點」與「敘述層次」等兩方面，在本書中頗有著甚為明顯的提示。

本書在事實和文字本身所可確定的錯誤，可說很少，郭沫若所撰「北伐途次」一文，被譯為“The Northern Expediton”而非“On the Way of the Northern Expediton”，算是一點小錯（頁三四八）。Tsining-Kunchow（頁一九五）應為Tsining-Yenchow（濟寧-兗州）之誤。頁二〇一稱中國留駐濟南城的兩連兵力，為數五百人，錯；兩連應只有二百至三百人左右。

總之，中日戰爭的結束，到現在已經快四十年了，在此近四十年期間，中國與日本都發生了極重大的變革。回顧過去，戰前日本帝國主義者包括軍人與政治家實在都太低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誤認在民族、政治、文化、經濟均為基本上「中國的」東北為其「生命線」，而輕於一擲進向大陸發展；因而使前此五十多年來日本由於對外侵略所辛勤建立起來的「帝國」，終至全盤崩潰，屈膝投降。戰前日本對中國觀點的一些重大謬誤，主要是在基本性的一些「前提」方面。這點雖在我們史學工作者所重建的「史實」之外，但在重建史實的過程與綜述中，卻是應充分

予以說明的一些方面。本書似乎有意地想規避此類「價值性」的判斷，實大大降低了本書的全盤價值。所以，我認為本書雖為佳著，但從史學著作的更高水準來看，究難算做最上乘的著作。